

# 蔣介石與二次 大戰的德國 (1940-1945) ——重探德國 和瑞士的檔案

Nele F. Glang 英國 University of Sheffield 博士生

## 壹、前言

中華民國於 1949 年之前的外交關係一直是西方及華語學者的研究重點。許多人側重於中美、中蘇或中日關係的研究，此外還有一小部分對於中德外交關係的探討。像是柯偉林 (William C. Kirby)、貝恩德馬丁 (Bernd Martin)、福克斯 (John P. Fox)、梁錫輝 (音譯: Hsi-Huey Liang) 及傅寶真 (註1) 等人的著作都為現今的中德外交關係研究奠定了基礎。(註2)

上述的重要研究學者大多使用歐洲、東亞、美國和英國的檔案資料做研究。在 1970 或 1980 年代尚可以口述採訪談的方法來研究，但是由於當事人現今多已不在世，目前要進行口訪工作十分困難。因此，檔案史料成為研究的重要基礎。這篇論文的重點在介紹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關於中德關係的德文檔案史料，希望能提供準備到當地查資料的學者一些有用的資訊。

過去的中德關係研究多著重在凡爾賽條約時期，本文則希望把研究年代從凡爾賽條約後轉移到 1930 年代後期 (1939 年至 1945 年)。這一段時間的中德關係並不是目前學界的研究重點，檔案材料也較少為人所知。

作者本身的研究主題則是二次大戰時的中德關係，因此本文主要在介紹這段期間中的官方及非官方的外交檔案，包括德國或外國代表的情報資料。但是不包含經濟或文化方面的檔案材料。若是要查詢本文範圍以外

的檔案可以直接詢問檔案館或透過線上目錄查詢。

作者的研究主題為探討戰時蔣介石和兩個德國政治集團的關係。這兩個政治集團一個是《柏林》，《柏林》指的是在納粹政府中的人員，由蓋世太保（Gestapo）首領希姆勒（Heinrich Himmler）和黨衛軍安全部門（SD）的海德里希（Reinhard Heydrich）所組成的政治集團。（註3）這兩人都有參與德國納粹黨的國家安全總局（Reichsicherheitshauptamt, Reich Main Security Office, RSHA），他們也利用其影響力來左右納粹德國的外交政策和軍事活動。另外一個政治集團則是 1944 年 7 月 20 日刺殺希特勒的暗殺組織。以下本文所提及的德國抵抗運動皆為軍界密謀組織和克萊稍集團。（註4）本文內容將會著重在這兩個德國政治團體和中國關係的相關文件檔案。

本文將分為兩個部分。分別介紹德國檔案館，和瑞士檔案館。最後，作者將補充一些歐洲其他檔案館可供參考的文獻。

有關瑞士檔案館館藏的內容可能更令人驚訝。中德關係在 1941 年 7 月雙方斷交後，官方外交轉為秘密接觸。這段期間國家安全總局主導整個中德關係，不論是外交和軍事情報蒐集都有密切的關係。因為瑞士在二戰時期的中立立場，中德斷交後瑞士便成為中國和德國代表會面的重要地點。如同德國明斯特大學波納特教授（Heike Bungert）指出，這些文件必須受到國際關係研究學者的重視。（註5）

## 貳、德國檔案館

在德國，主要收藏外交事務檔案的檔案館為德國外交部檔案館（Politisches Archiv des Auswärtigen Amtes）及德國聯邦政府檔案館（Bundesarchiv）。這兩個檔案館的館藏年代橫跨久遠，從德意志帝國、威瑪共和國、納粹德國一直到二戰後的德國。同樣的，瑞士聯邦政府檔案館（Bundesarchiv）是瑞士聯邦政府收藏所有官方文件的主要檔案館。其館藏包含瑞士在二戰期間保持中立的相關檔案，首都伯恩（Bern）在這段期間則是間諜活動中心。（註6）

在申請查檔的時候，各個檔案館的規定限制會有所不同，但是在制度上對於檔案關係人死後 30 年才能公開文件的保護是相同的。對於研究二戰時期中德關係的專家學者而言，在德國或瑞士並沒有特別的限制。德國的檔案館所有的檔案原文都是德文，瑞士檔案館則有小部分的檔案使用法文。

許多歐洲或東亞國家的檔案館都有二戰時期文件遭到大規模破壞的情形。有些文件可以找到微型膠片，或者複製拷貝的版本。

### 一、德國外交部檔案館（Politisches Archiv des Auswärtigen Amtes）（註7）



德國外交部檔案館閱覽室（註8）

自從兩德統一後，德國外交部檔案館從前西德首都波昂（Bonn）遷到柏林。其館藏年代從 1867 年到 1945 年（德意志帝國、威瑪共和國到納粹德國）以及 1949 年後到今日的檔案。主要檔案來源是德國外交部和駐外大使館、領事館，包含德國駐中國大使館。目前德國外交部檔案館並不開放線上目錄查詢，但是可以電子郵件詢問館藏等相關問題。通常館方會主動詢問研究動機，另外檔案館的座位有限，必須事先預約。

## 二、德國外交部檔案館館藏介紹

德國外交部檔案館的收藏是依據德方代表派駐地分類，檔案夾也以派駐地為名。有關中華民國的檔案，是由北京、上海、南京和重慶這幾個城市的收發機關傳送到柏林。因此有幾個檔案夾以《Peking》為題，並附上日期作為識別。其他還有標題為《Peking II》（R 9208/2339）、《Laenderakten

China》（中國國家檔案）（R 102368）等檔案夾。另外，國務院秘書魏次澤克（Ernst von Weizsaecker）的個人檔案（R 29840）也有許多重要的材料，當中收藏許多中國大使館要員和柏林的通訊內容。

在上一段所提到的分類目錄名稱都是德文。因此，中國地名和人名的寫法也和今日常用寫法不同。同時，若使用人名或關鍵字來查詢也十分困難，因為目錄分類方法以地名為主，幾乎沒有人名。在做 1949 年以前的中德關係資料搜尋時，會發現有大量的經濟、文化和政治合作與交流的材料。

這些檔案的內容主要為駐中國使領館和外交部往來的報告文件。還包含了派駐在中國使館的德國情報人員所做的定期報告。大部分的外交例行報告為大使館內部作業或者與中方政要會面的情形。再者，這些檔案也包含剪報或描寫中國政治情況、對民意動向觀察的文章。這些檔案都成為德國官方在做東亞外交政策決斷的憑據，或成為了解中國的資訊來源。

蔣介石國民政府和納粹德國的官方外交關係一直維持到 1941 年 7 月。納粹德國承認汪精衛政權後，斷交後的外交部檔案有明顯改變，由於德國駐中國大使館的關閉，因此從重慶傳回來的資訊中斷，不過德國代表遷往南京與汪精衛政權交流後，仍可以發現德國官方依然對重慶政府持續關注。和 1941 年 7 月之前比較，重慶方面的資料減少，資訊來源則變成間接由德國駐華人員處

取得。

然而，官方外交渠道的關閉，毫無疑問的造成德方對全中國的情報蒐集活動增加。這些情報蒐集的報告從外交部的外交途徑抵達柏林。情報系統介入外交活動的情況，就像貝里居和詹姆士（Berridge and James）在書中指出外交系統和情報系統的重疊已有跡可循。特別是軍方代表「成為情報機關和外交機關的重要窗口」，讓這些駐外武官更顯重要。（註9）

這些情報報告在1941年7月中德官方關係結束前就已經存在，這些報告並證明了德國和中國重慶政府在1941年7月之後的持續發展。研究者可以從一系列的官方外交文件和情報工作文件來描繪出這兩個國家之間的秘密外交關係和目的。（註10）

在德國外交部檔案館做研究工作會看到兩個來源不同的情報機構匯報：一個是德國國防部情報局（Abwehr），另外一個是較不為人知的納粹國家安全局（RSHA）。（註11）這兩個情報機構當時在中國都有活動。拉騰霍夫（Ratenhof）曾經提到國家安全局在1941年和1942年曾嘗試在上海介入中日斡旋，甚至在1944年又嘗試了一次。（註12）這些檔案名稱的寫法可能有幾下幾種：《國防、匯報情報從KO中國》（Abwehr Berichte u. Meldungen des KO China）、《Akten betr. Abwehr + Allgemein'》（R101997）。

在日本占領區的德國使領館的資料直到

1945年初才傳到柏林本部。大部分的文件是來自位於上海的德國大使館，其中常常夾帶重慶政府親德方或親美方的訊息，其他情報如西方列強和中華民國的關係，甚至一些關於中日間或中蘇間的談判傳聞。然而，軍方情報機關蒐集的資訊除了來自各地使領館外，也有直接來自駐瑞士首都伯恩武官的資訊。因為伯恩是當時重要的情報中心，當地的軍方情報人員定期向柏林匯報任何有關戰爭的消息，其中也包含中日關係。（註13）一般來說，我們可以由這些軍方情資所包含的材料和範圍，來探討德方對重慶政府的利害關係。德方對任何情報的重視，可見柏林方面非常關注東亞情勢的變化和其對軸心國的影響。（註14）

總而言之，對於研究1939年後中德關係的研究者來說，德國外交部檔案存有豐富的材料。雖然本文觀察的重點在外交檔案上，但是不能忽視外交以外的其他檔案，因為德國外交部和使領館也負責文化、貿易合作等工作。

隨著中德邦交在1941年7月結束，德國駐華大使館轉移到日軍占領區。有關重慶政府的文件也被軍情機構來源的文件如國家安全局及德國國防部取代。然而，若想找到明確提及中國、國家安全局及德國抵抗運動（軍界密謀組織和克萊稍集團）的三者連結的材料仍有其困難性。原因是當時德國親日的立場，讓中國外交人員只能尋求其他溝通的管道。我們可以在德國聯邦檔案館找到

相關的材料。

### 三、德國聯邦政府檔案館 (Bundesarchiv)

(註 15)



德國聯邦政府檔案館柏林館區 (註 16)

另外一個研究中德關係學者必須留意的檔案館是德國聯邦政府檔案館 (Bundesarchiv)。跟德國外交部檔案館僅有外交文件相較，聯邦政府檔案館館藏所涉及的内容更為廣泛，包含所有聯邦政府機關在內。因此，聯邦政府檔案館在德國許多地方設有分館，不過最重要的館藏則是在柏林。(註 17) 聯邦政府檔案館有兩個分館對中德關係研究者較為重要，一個位於柏林 - 里歇兒費爾德區 (Lichterfelde)，另一個則是位於佛萊堡 (Freiburg) 的軍事檔案館。聯邦政府檔案館有線上目錄查詢的服務，但是要提醒各位研究者注意檔案保存地點的確切位置。所有的檔案都標示著館

藏，但不會完整標出館藏位置。搜尋時可以《China》、《Tschiang Kaischek》等作為關鍵字。並建議使用德國常用的中文拼音拼法，就像在德國外交部檔案館同樣情況，檔案名稱和現今的漢語拼音與威妥瑪拼音不同。

### 四、德國聯邦政府檔案館館藏

#### 柏林館區

柏林館區的館藏年代從中世紀一直到 1945 年。其中的 R 類檔 (Abteilung R) 主要收藏納粹德國時期的檔案。包括帝國總理府 (Reichskanzlei)、外交部、財政部、經濟部、納粹黨外交事務辦公室 (Aussenpolitisches Amt, APA)、國防部及國家安全局等部門的檔案。柏林館藏還包括納粹黨 (Nationalsozialistische Deutsche Arbeiterpartei, NSDAP)、黨主席等納粹黨相關的檔案。

從德國聯邦檔案館收藏的這些檔案文獻中，可以了解戰時德國有許多機構爭相蒐集情報。以上所列的幾個機構中，外交部、納粹黨外交事務辦公室、國防部還有國家安全局都是各自獨立且設有外國辦公室的情報蒐集機構。然而，我們必須注意每個機構蒐集情報的目的，才能了解各個情報系統的性質，德國政府機關和納粹黨的對立讓這兩方產生情報競爭的情況。(註 18) 每一個情報機關都有其不同的情報來源，不論是在軸心國或是同盟國，甚至中立國都成為這些情報機

構活動的地方。特別是中立國的情報源是最重要的，這些在中立國的德方情報人員或領事館人員要在敵我之間處心積慮對抗。特別強調，在瑞士有一特別情報部門是專職負責有關重慶國民政府與同盟國及日本關係的。

在此，作者想特別提出幾個聯邦檔案館的館藏檔案來討論。檔案 R 58/1116 和檔案 R 58/1123 這兩個檔案夾的內容是國家安全局的情報人員對重慶國民政府做的報告，這兩份報告的日期一直持續到 1944 年年底。這兩個檔案是放在一系列的國家情報當中。此外，檔案夾 R 8034II/7302 收藏了一系列的剪報和文章，內容聚焦在中國政治情況和中國與納粹德國的關係，文件的時間從 1942 年底一直到 1944 年。這些檔案可能是在 1939 年到 1945 年 5 月間歸檔的。

若是要在德國檔案館尋找有關重慶國民政府和德國抵抗運動（軍界密謀組織和克萊稍集團）的連結並不容易。在德國抵抗運動暗殺希特勒的計畫失敗後，抵抗運動幾乎被納粹政府瓦解。許多抵抗運動的成員被納粹政府拘禁嚴刑逼供。這些逼供的報告透露許多抵抗運動和外國的連結。（註 19）有關這方面的研究瑞士的檔案館也有相關資訊，我們將會在下一部分討論。

有一些檔案筆者僅在搜尋時看到了目錄，但沒有實地調閱。例如用關鍵字《China》查詢，在檔案館的線上目錄會出現納粹黨外交事務辦公室的檔案。納粹外交事務辦公室是由納粹黨的主要思想領袖

羅森堡（Alfred Rosenberg）所領導，這個單位的觀察重點為各國的新聞界、經濟、戰略及內政外交政策，檔案中有許多國家的觀察報告，中國也在其中。（註 20）例如：檔案 NS 43/312 《Tschungking》收入了有關 1942 年的重慶國民政府的報告，另外檔案 NS 43/398 記錄了日本對歐戰的態度，以及與納粹領導階層的相關議題。這些檔案都涉及到中日關係還有中日戰爭。

### 佛萊堡館區

德國聯邦檔案館佛萊堡館區的館藏大部分都是有關德國軍事文件、軍事行動或者是領導階層決策性質的文件。除此之外，檔案館也藏有一些軍官的個人史料，如法肯豪森將軍（Alexander von Falkenhausen）、喬治托瑪斯將軍（Georg Thomas）等人。法肯豪森將軍和中國關係非常密切，而喬治托瑪斯則是德國抵抗運動的重要人物。特別是有關法肯豪森將軍的文件相當豐富，他和蔣介石及其他中國重要領導人的聯繫非常頻繁。由這些文件可以看出法肯豪森將軍和中國的聯繫一直維持到 1938 年夏天他被召回德國。但是，法肯豪森和中國軍政要人如何應欽或俞大維等人的私人交流在二戰期間還一直持續，甚至是到二戰結束之後。（註 21）（註 22）除此之外，在二戰時有一些被派駐在歐洲的國民政府代表，如在二戰時期駐維琪法國和德占比利時的中國代表都有和法肯豪森將軍聯絡。其中，檔案中還可見到法肯

豪森將軍在他任內極力維護德國和中國的關係，期間他和中國駐柏林武官桂永清也有數次會面。(註23)

德國國防軍最高統帥的檔案是以不同的戰區做分類，其中有一份是「遠東」，所包含國家有日本、中國和印度，不過這份檔案跟法肯豪森將軍的個人史料比較起來並不豐富。另外，有關中日貿易合作的檔案中也包含了中日談判過程、中國與同盟國的糾紛，以及重慶國民政府中親美和親德的派系糾紛等資料。(註24)

相較於德國外交部的檔案，聯邦檔案館的典藏中較多關於中德秘密接觸的資訊。這和二戰期間的秘密協商有關，不管是軸心國或同盟國都有類似的秘密協議。這些外交檔案和納粹機構檔案不同，也和外交政策或者情報檔案不同，其中卻也都包含中國資訊。很明顯的，這些檔案的型態和目的也都因為來源不同而有差異，就以納粹黨外交事務辦公室和國家安全局兩者來比較。納粹黨外交辦公室搜集一般性的中國資訊，而國家安全局卻著重在間諜情報和戰爭資訊。

普遍來說，研究者可以透過檔案館藏發現，在美國加入二戰後及德國對蘇聯的戰事緩和時，德方對重慶國民政府的重視。若在當時中日能夠達成停戰協議，納粹德國政府將可從中得利。因此，所有的資訊都集中在重慶國民政府親德派以及中國和同盟國決裂的可能性。

## 五、其他有用檔案資訊

在德國還有其他檔案館，例如位在慕尼黑的當代歷史學會(Institut fuer Zeitgeschichte)。當代歷史學會所藏的檔案並非政府機構的檔案，而是私人或者政黨機構的檔案，如納粹黨或者其他的政黨。當代歷史學會的目錄是以人名為基礎，每個檔案夾都有檔案的重要資訊和內容。輸入關鍵字如《China》、《Tschiang》可以查到許多從1920年到1930年甚至戰後的文件。而檔案內容從德國民間人士跟中國的關係、在中國的德國私人機構，或者是政治、宗教團體在上海地區的活動。(註25)此外，當代歷史學會也藏有許多回憶錄，例如國家安全局局長施倫堡(Walter Schellenberg)的回憶錄。這些檔案都必需要認真研究，因為施倫堡的回憶錄提供了二戰情報蒐集系統如何運作及國家安全局和重慶政府的關係等重要資訊。(註26)即使是規模較小的檔案館也能提供重要的資訊。建議研究者事先在線上查詢檔案目錄，確定檔案是否可以調閱。

## 六、小結

德國外交部檔案館和聯邦政府檔案館是所有研究1939年前後中德關係學者必訪的檔案館。

德國外交部檔案館收藏所有在中國的德國官方外交機構史料，而聯邦政府檔案館則藏有大量在德國的情報活動、或者是國際間諜的資訊，規模較小的檔案館如當代歷史學

會也可能藏有有用的資訊。研究者可以參考檔案館的解說和標示來查閱檔案或者預約閱覽室的座位，甚至可以使用翻譯機。建議有興趣到德國參觀訪問的學者將各種類型的檔案館列入訪問行程中。

### 叁、瑞士聯邦政府檔案館 (註27)



Figure 3. The building of the Swiss Federal Archives (註28)

瑞士是一個多語言的國家，三種官方語言為德文、法文及義大利文。位於首都伯恩的聯邦政府檔案館所藏的大多數是德文檔案，另有一小部分法文檔案。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所有的政黨機構主要集中在伯恩和日內瓦，大部分的機構在這兩地都設有辦公室，設立的原因和情報活動有關，而中華民國和日本都是情報蒐集的對象。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保持中立的瑞士特

別關注外國情報活動在境內的發展，瑞士也了解任何非中立的行動都有可能引來德國的攻擊。因此在瑞士聯邦檔案館有許多的檔案文件是關於交戰雙方，其中最多的是關於位於歐洲的同盟國和德國。不過相較之下，有關中國或者是日本在瑞士的間諜活動資料卻較少，即使重慶國民政府在當時已經是同盟國四大要員之一。總之，這反應了瑞士當局對於歐洲戰場的關注是遠勝於中國戰場和遠東局勢的。中德關係的研究學者並不常使用瑞士聯邦檔案館，但是檔案館的材料非常有研究價值。(註29)下面將提供一些可能有用的資訊還有典藏號。這些僅是檔案館典藏的一部分，也許還有更詳細的資料在其他檔案夾中。可以使用線上目錄查詢來做初步的搜尋。

#### 一、瑞士聯邦檔案館館藏內容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國際情報人員在瑞士的活動眾所皆知，不論是同盟國或者軸心國的情報活動都對瑞士在二戰時的中立立場可能造成威脅。因此，有許多的戰時或戰後的檔案顯示，許多納粹德國的外交代表人員及其活動都被瑞士政府監視(E2001E#1972/33)。同樣的，有許多文件證明瑞士當局也觀察其他歐洲國家或亞洲國家的外交人員，他們的面會記錄、活動或者背景都被記錄下來(E4320B#1984/29)。因為外交和情報往往僅一線之隔，這些駐外館也常常和德國或者同盟國的情報間諜活

動相連結，例如有文件可證明納粹德國國家安全局曾和瑞士的情報局頭目梅森（Robert Mason）談判。（註30）

德國的檔案館保存了德國外交人員從伯恩寄回的報告，其中含有關於中國和日本在歐洲的活動情形。但是在瑞士的檔案館卻沒有保存這一類的材料，不過還是可以在伯恩檔案館中找到1941年7月中德斷交後以及1945年後中華民國和德國私人交流的資料。

在瑞士聯邦檔案館做線上目錄搜尋非常容易，和德國外交部檔案館不同的是，這裡可以用關鍵字搜尋人名。然而，中文名字的拼音還是不同於漢語拼音。若是依照以上的方法會看到外國外交使館檔案（E2001D#1000/1553）。

除了中國使領館人員的相關檔案外，也可以尋找一些居住於瑞士或者常常在瑞士旅行和中國有關係的德國人。例如HAPRO（合步樓企業）（註31）的創始人克蘭（Hans Klein），他是中國駐伯恩的榮譽領事（E2001E#1967/113; E4320B#1984/29）。（註32）所有德國人和外國人士的交往都被瑞士政府嚴密觀察，特別是和納粹政府親密的人士。在檔案中不隻可以看到克蘭和中國人的交往情形，甚至他和其他德國人的交流也都被記錄在檔案裡。克蘭被封為榮譽領事很可能是因為他在德國和重慶國民政府之間擔任交流工作。這只是中國和德國的秘密外交之中的一個例子。

雖然瑞士聯邦檔案館在關於中國外交及情報工作方面的館藏並不完整，但這並不代表伯恩檔案館沒有研究價值，例如在日內瓦的檔案館中還藏有國聯史料，當中有許多證據可以證明中華民國在日內瓦做了很多宣傳工作。這對研究相關主題的學者都會是很有用的資訊。

總的來說，瑞士聯邦政府檔案館藏有許多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情報工作材料，也包含二戰前後各國在瑞士的間諜活動。瑞士首都伯恩在二戰時期成為間諜聚集的中心，因此也藏有最多的情報資訊。但若是研究中日關係或者中國間諜活動，瑞士聯邦政府檔案館的材料並不完整，但可以從中了解大概。在國聯的建立後，直到1945年聯合國成立為止國聯的主要辦公室都設在日內瓦，讓日內瓦又成為了另外一個重要的情報中心。

## 二、其他有用的資訊或者出版文章

除了本文提到的檔案館外，在歐洲其他國家也可以找到一些檔案或其他國家檔案館館藏。除了德國和瑞士，也可以考慮到位於倫敦近郊的大不列顛國家檔案館。（註33）在其公共機關記錄檔案裡有許多戰時各大使館、情報人員和倫敦的文書交流。另外，英國國家圖書館（註34）也值得列入考慮，其中印度事務部的館藏中有許多關於東亞和南亞的資料，其中也包括中華民國。例如藏有二戰時期重慶國民政府傾德立場及其影響的觀察和報告。（註35）

另外在德國有幾套已出版的檔案資料選輯。其中，勒兀爾（Mechthild Leutner）和馬丁（Bernd Martin）出版了一套檔案彙編，包含德國（外交部檔案館和德國聯邦檔案館）、亞洲（臺北國史館和南京第二檔案館）及英國（大不列顛國家檔案館和國家圖書館）等地的檔案。（註36）不止可以讓研究者快速了解每個檔案館的主要檔案館藏，也可以讓研究者馬上找出有用的資訊。如此的檔案彙編可以做為史料，也可以成為很好用的檔案搜尋工具。

## 肆、結論

這篇文章希望在中華民國和德國的關係研究上能提出更多尚未被注意的德國文獻。以上提及的檔案大多數藏在德國的檔案館，另一部分在瑞士。瑞士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而在瑞士的檔案館也能找到重要的材料來支持中德在 1941 年之後的關係，特別是當時中德雙方官方外交關係已斷絕的情況下。

研究中德關係的其中一個重要環節就是德國官方對於蔣介石政權和汪精衛政權都保持一定的外交關係。而 1941 年 7 月之後重慶國民政府和德國的關係並沒有因為斷交而完全斷絕。重慶國民政府的交流是透過中立國間接傳達。如果我們不單只看外交文件，而是把情報系統的文件也當成重要材料。就會發現重慶國民政府和德方的交流並

不比 1941 年 7 月斷交前要少。

作者誠摯希望這篇文章能讓華語學者注意到德文文獻並能到德國來尋找可能的檔案研究。

### 【註釋】

\* 特別感謝陳巧穎協助將這篇文章由英文翻譯成中文。

1. 英文及德文的研究有：Stefan Berleb (2005), 'for China's Benefit': The Evolution and Devolution of German Influence on Chinese Military Affairs, 1919-1938', PhD diss., Queensland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Human Services; John P. Fox, *Germany and the Far Eastern Crisis 1931-1938, A Study in Diplomacy and Ideolog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2); William C. Kirby, *Germany and Republican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Bernd Martin (ed.), *Die deutsche Beraterschaft in China 1927-1938: Militär, Wirtschaft, Aussenpolitik*, (The German Advisor Group in China 1927-1938: Military, Economy, Foreign Policy), (Düsseldorf: Droste 1981). 中文著作有：蔡勝、吳佳佳，〈二戰期間中德宣戰原因管窺〉，《黃山學院學報》第 1 期（2006 年），頁 52-55；陳仁霞，〈中日德三角關係〉（北京：三聯書店，2003 年）。
2. Fu Pao-jen, 'Military Advisers and German Assistance for Chinese Industrialization: An Analysis of Sino-German Economic and Military Collaboration', 187-200 in Bernd Martin (ed.), *Die deutsche Beraterschaft in China 1927-1938: Militär, Wirtschaft, Aussenpolitik*. Hsi-Huey Liang, *The Sino-German Connection: Alexander von Falkenhausen between China and Germany 1900-1941*, (Amsterdam: Van Gorcum 1987), and Hsi-Huey Liang, 'China, the Sino-Japanese Conflict

- and the Munich Crisis', *Diplomacy & Statecraft*, 10/ 2-3 (1999) pp.342-369。
3. Yehoshua Büchler, "Kommandostab Reichsführer-SS: Himmler's Personal Murder Brigades in 1941", *Holocaust and Genocide Studies*, 1/1 (1986), 11-25, p.11。
  4. 參考：Hans Bernd Gisevius, *Valkyrie: An Insider's Account of the Plot to Kill Hitler*, (Philadelphia: Da Capo Press 2009); Peter Hoffmann, 'Peace through Coupe d'état: The Foreign Contacts of the German Resistance 1933-1944', *Central European History* 19/1 (1986), 3-44; Peter Hoffmann, *The history of the German resistance* (London and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1977)。
  5. Heike Bungert, 'Secret Messages: Codebreaking and American Diplomacy, 1930-1945 by David Alvarez; Intelligence and the War against Japan: Britain, America and the Politics of Secret Service by Richard J. Aldrich', *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88/3 (2001), 1140-1141, p.1140。
  6. Anthony Read and David Fisher, *Operation Lucy: Most Secret Spy Ring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London: Hodder and Stoughton 1980), p.113。
  7. 見：<http://www.archiv.diplo.de/>。
  8. Fig. 1. Auswärtiges Amt. *Der Lesesaal*. Source: Ein Archiv im Tresor, [http://www.kinder.diplo.de/Vertretung/kinder/de/\\_\\_\\_pr/DiplomatenUndBM/110930\\_\\_Politisches\\_\\_Archiv.html](http://www.kinder.diplo.de/Vertretung/kinder/de/___pr/DiplomatenUndBM/110930__Politisches__Archiv.html) (24 May 2014)。
  9. G.R. Berridge and Alan James, *A Dictionary of Diplomacy*,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03), p.243。
  10. 進行秘密外交的日常工作，大多是和官方的外交人員做條約、協議的談判，場景通常在地主國。José Calvet de Magalhães, *The Pure Concept of Diplomacy*, (Westport: Greenwood Press 1988), p.72。
  11. Abwehr 是德國官方的情報系統。他的局長是海軍上將迦納利 (Wilhelm Canaris)，在他任職期間安排許多抵抗運動的成員在國防部情報系統任職 (Liang, *The Sino-German Connection*, p.163)。
  12. 有關國防部情報系統在這篇文章不多做敘述，更多詳情請見：Karl Heinz Abshagen, *Canaris, Patriot und Weltbürger* (Canaris, Patriot and Citizen of the World), (Stuttgart: Union Deutsche Verlagsgesellschaft 1954)。
  13. Udo Ratenhof, *Die Chinapolitik des Deutschen Reiches 1871 bis 1945: Wirtschaft- Ruestung- Militaer* (The Third Reich s China policy: Economy, Armament, Military), (Boppard am Rhein: Harald Boldt Verlag 1987), p.532。
  14. Ratenhof quotes: "Reichsicherheitshauptamt an OKW-Feldwirtschaftsamt ". 8 June, 28 July, and 20 September 1944, BA-MA, Wi II C / 5.4。
  15. 德國武官依斯曼 (Iwan von Ilsemann): PA AA Bern 5825 Geheim (secret)。
  16. 希特勒非常希望日本由東進攻蘇聯，但是這並沒有發生。Walter Schellenberg, *The Schellenberg Memoirs*, (London: Andre Deutsch 1956) p.273-274。
  17. 見：<http://www.bundesarchiv.de/bundesarchiv/index.html.en>。
  18. Fig. 2. T. Krause. *Liegenschaft Berlin-Lichterfelde mit dem neuen Magazingebäude (Ernst-Posner-Bau) im Hintergrund*. Berlin, Bundesarchiv. Source: Berlin Lichterfelde, [http://www.bundesarchiv.de/bundesarchiv/dienstorte/berlin\\_lichterfelde/index.html.de](http://www.bundesarchiv.de/bundesarchiv/dienstorte/berlin_lichterfelde/index.html.de) (24 May 2014)。
  19. 若要了解德國聯邦政府檔案館分館位置，請見：<http://www.bundesarchiv.de/bundesarchiv/index.html.en>。查詢日期 2014 年三月六日。
  20. Zachary Shore, *What Hitler Knew: The Battle for Information in Nazi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6。
  21. 請參照檔案：BArch NS 6/9。
  22. BArch NS 43/156; NS 43/321; NS 43/346; NS 43/312. Eckart Conze, Norbert Frei, Peter Hayes,

- and Moshe Zimmermann, *Das Amt und die Vergangenheit: Deutsche Diplomaten im Dritten Reich und in der Bundesrepublik* (The office and the past: German diplomats during the Third Reich and the federal Republic), (München: Karl Blessing Verlag 2010) p.89. 這個檔案的一部分是關於中國，另外一部分是關於日本。另外也有專門屬於日本的檔案，主要著重在中日戰爭。請見：BArch NS 43/401; NS 43/382。
21. 詳情請見：Chern Chen (2003), “Deutsche Militaerberater in Taiwan” (Germany military advisers in Taiwan), *Vierteljahreshefte fuer Zeitgeschichte*, 51/3 (2003) 385-404. For information on post-1945 correspondence see: N 246/15; N 246/18; N 246/19。
  22. BArch N 246/13。
  23. 同上。有關中華民國派駐在歐洲的交流人員請參照：BArch N 246/13。
  24. BArch RW 4/693。
  25. 請見：IfZ, ED 207，有關新教教會在中國的資訊。也請見：ED 157, Correspondence Kordt, Theo and Kordt, Erich，在線上目錄查詢可見中國和德國外交部私人交流的數量。
  26. IfZ, ED 90, Schellenberg, Walter, SS-Gruf. Memoiren 1939-1944。
  27. 見：<http://www.bar.admin.ch/index.html?lang=en>。
  28. Fig. 3. *The building of the Swiss Federal Archives*. Berne, Swiss Federal Archives. Source: The Swiss Federal Archives, <http://www.bar.admin.ch/org/index.html?lang=en> (24 May 2014)。
  29. 除了梁錫輝。見：Liang, *The Sino-German Connection*。
  30. Pierre-Th Braunschweig, *Geheimer Draht nach Berlin: die Nachrichtenlinie Masson-Schellenberg und der schweizerische Geheimdienst im Zweiten Weltkrieg* (Secret Line to Berlin: the Communication line Masson-Schellenberg and the Swiss Secret Service in WWII), (Zürich: Verlag Neue Züricher Zeitung 1989)。
  31. HAPRO 企業德文名：*Handesgesellschaft fuer Industrielle Produkte*，是一個工業產品的貿易公司。若要了解克蘭與中華民國的關係請見：Kirby, *Germany and Republican China*。
  32. Liang, *The Sino-German Connection*, p.114。Liang 提到：*Interviews*, Lily Abegg Zürich 28 January 1974; Robert Chi Lucerne 26 July 1973。有關克蘭被封為榮譽大使請見：CH-BAR#E4320B#1984/29#652\*。BArch R 58(Aussenpolitische Ziele der USA und GB. Insb. Verhaeltnis zur Sowjetunion. Meldungen von V-Leuten ueber Aeusserungen von Staatsangehoerigen dieser Laender und neutraler Staaten und Pressemeldungen)/1123。(美國和英國的外交關係目的，和蘇聯有關的部分。為於這些國家情報蒐集人的情報資訊、中立國的出版)。
  33. 見：<http://www.nationalarchives.gov.uk/>。
  34. 見：<http://www.bl.uk/>。
  35. British Library, IOR, L/ P&S/ 12/ 2293, China, Sino-British Relations。
  36. Bernd Martin (ed), *Deutsch-chinesische Beziehungen, 1928-1937: “Gleiche” Partner unter “ungleichen” Bedingungen*, (Berlin: Akademie Verlag 2003); Mechthild Leutner (ed.), *Deutschland und China, 1937-1949: Politik – Militaer – Wirtschaft - Kultur*, (Berlin: Akademie Verlag 1998)。此套史料彙編是德文。